

## 实践哲学:《资本论》哲学性质的新阐释<sup>〔\*〕</sup>

○ 鲍 金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从哲学性质来看,《资本论》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即作为实践的哲学。基于实践哲学的自反性质,《资本论》的哲学既表现为实践的观念构成环节,又现实地转化为人们的实践,这里的“实践”正是贯穿《资本论》的问题式,即“改变世界”,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资本论》的实践哲学就体现为“改变世界”这一宏大事业的不同侧面:经济、政治和批判,或者说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和批判哲学。这三种表现形态在《资本论》所展示的哲学空间中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地共存着,共同支撑着《资本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形态。

〔关键词〕实践哲学;《资本论》;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批判哲学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1.005

仔细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蕴,会发现它存在着一种难解的现象:作为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没有显性的体系形式,也缺乏明确的哲学话语形式,这能叫做“哲学”吗?这被阿尔都塞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sup>〔1〕</sup>之所以说它存在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着巨大的哲学效应,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地,产生出众多后继的哲学理论,一个产生出巨大哲学效应和后继哲学理论的东西

---

作者简介:鲍金,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本文系 2017 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批准号:2017YZD09)、2017 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普遍性研究范式与意识形态建设方略研究”(编号:17SG56)的阶段性成果。

怎么能不是哲学呢?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不是在传统哲学乃至现代哲学所习惯的理路、话语和表现形态中形成的,如果在传统哲学乃至现代哲学的路径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会认为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马克思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

上述“令人感到难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当然也适用于《资本论》的哲学,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那种“悖论性质”。因此,难题和解决难题的关键也就同时产生了:究竟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具体来说,《资本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如果有的话,《资本论》的哲学表现为什么样性质的哲学?回答是明确的:《资本论》有自己的哲学,而且这种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动词性而非名词性的哲学,即作为实践的哲学、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的哲学或“实践”着的哲学。《资本论》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正是在传统哲学乃至现代哲学视野中根本算不上哲学著作的《资本论》,不仅产生着巨大的哲学效应,而且也是被当做“哲学”来生产的,只不过不是按照“理论哲学”来生产的,而是按照“实践哲学”来生产的。

### 一、实践哲学:作为实践的哲学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实践哲学的意蕴,从而为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奠定基础,我们以理论哲学作为参照系来阐述实践哲学。理论哲学认为理论可以涵盖包括实践活动在内的人们的生活整体,理论不仅独立于实践,而且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相比于这种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将实践作为人的涵盖生活整体的基本活动方式,并且不承认理论相对于实践的绝对独立性。然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实践哲学也可能在自己理论的实际展开过程中仍然遵循理论哲学的固有方式去从事关于实践的研究。毕竟,哲学的自我申明和实际展开过程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两者既可以完全一致,也可以截然对立。如果是后者的话,这种实践哲学就变成了名义上的实践哲学、实质上的理论哲学,而马克思哲学之前的所谓实践哲学其实就是这样的实践哲学。直到马克思哲学,实践哲学才真正获得了自己的本真形态,即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内容层面上主张实践是人的涵盖生活整体的基本活动方式,而且在表现形态层面上彻底地展示为一种作为实践的哲学、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的哲学或“实践”着的哲学,表现为一种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哲学而言,就其将实践作为人的涵盖生活整体的基本活动方式而言,与这种哲学的要求相一致的哲学表现形态只能是采取实践形态的哲学。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哲学取得了所研究的实践问题和所表现的实践形态的高度统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作为实践的哲学”?在我们看来,作为实践的哲学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这种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观念的构成部分,着力于改变现存世界的社会结构这一事业,并将之看成是彻底批判以往一切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和根本途径;这种哲学自觉其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本身

的思想，能够直接地引导并现实地转化为人们的实践，即是“直接实践意义”上的；这种哲学就其表现形态而言，无非是实践的观念构成部分，但就其逻辑的可能性而言，却朝向自我批判、自我转化的方向，因为实践哲学的所谓“作为实践”，无非就是实践哲学成为非观念性的现实、实现为现实生活本身。极而言之，“作为实践的哲学”按照自己的逻辑推到极端，便是自身的消解，亦即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自反的，即实践哲学是一种指向自身消灭的哲学、一种废除哲学的哲学、一种为了最终废除自身又只能在其过程中强化自身的哲学。由于实践哲学始终只能在自反当中获得合理的表现形式，而自反最容易导向某一极端，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后世理解过程中就始终面临两种极易发生的危险：一是实践哲学“强化自身”的因素偏离“废除自身”的规定性，实践哲学朝着抽象化的方向越走越远，重新走到“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老路上去，并且强行让现实世界适应抽象理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滥觞于苏联时期的教科书哲学；二是实践哲学“废除自身”的规定性由合理形态扭曲为庸俗形态，下降到实践常识的水平，最终注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和经验论实证主义。这两种危险看似相反，实则同出一源，即都没有把握住实践哲学的自反性质，未能领会到实践哲学的张力结构，对实践哲学的超于实践又归于实践的辩证过程缺乏科学理解。

就此而言，我们当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关于废除哲学的思想。按照柯尔施的表述，“这一废除过程应当如何完成？或者它是否已经完成？通过什么行动来完成？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是对于谁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一废除哲学应当被看做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次思想上的行动而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吗？它的完成应当被认为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的呢，还是对于全体无产阶级，或者对于全人类来说的呢？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理解为（像国家的废除一样）一个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通过各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展开的革命过程？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只要这个艰巨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废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sup>[2]</sup>很明显，柯尔施的上述问题已经包含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只能在实践哲学的自反意义上加以理解。在我们看来，废除哲学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思想事件，而是必须伴随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漫长过程，毋宁说，为了实现最终的解放，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现实生活，实践哲学需要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强化自身，或改变自身存在的形式，因此只要解放目标尚未实现，废除哲学就只能被理解为实践哲学向现实生活转化的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实践哲学的“强化自身”，更是“废除自身”，而“强化自身”无非是为了最终“废除自身”，即直接地引导并同时转化为合理的现实生活。只有实践哲学实现了自身，合理的现实生活才会真正开始。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里的合理现实生活应当理解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生活，实践哲学无非便是服务于这种生活之实现的哲学。当这种生活实现的时候，实践

哲学“强化自身”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同时“废除自身”的状态也宣告实现。

## 二、《资本论》的实践哲学的生成

那么,《资本论》的哲学是怎样成为作为实践的哲学的呢?这一问题的真实涵义在于:《资本论》这一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工作何以能够同时成为合理现实生活之实现的哲学努力?由于《资本论》的哲学生成遵循了一条从哲学话语向经济学话语转变的路径,这就需要结合马克思的研究经历来说明。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的哲学原则曾经给予马克思观察问题的最初构架,即从思想观念的原则来把握现实生活的方式,但是马克思以朴素的眼光所发现的现实生活中私人利益总是占上风的情况冲击了他对国家、法和理性的幻想,最后连宣传普遍理性的《莱茵报》也被查封,这导致马克思对自己原有的把握现实生活的方式进行怀疑。用马克思后来的话说,就是“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sup>[3]</sup>这里的“难事”当然不是具体问题研究中的困难,而是用抽象原则解释现实问题这一仍属于理论哲学的方式的困难。正是这一困难,促使马克思重新对黑格尔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得到的结果便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sup>[4]</sup>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道路,而要揭开市民社会的秘密,只能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这就意味着,科学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研究,必须要摒弃从思想观念下降到现实生活的理论哲学方式,而应当遵循从现实生活本身发现问题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在市民社会没有得到解剖之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先行完全建立起来的。

比如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在不同阶段对该问题的研究方式就很不相同。在《1844年手稿》时期,马克思按照一种“人—非人—人”的先验框架来审视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人,就揭示异化这样一个现象的秘密而言,马克思对异化的先验审视距离科学的方式仍然非常遥远,重要原因便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是把异化看成了人类生活的一般条件,亦即从一般人性的视角来审视异化,而不是从经济学中去审视异化。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了异化问题,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应当深入到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等经济生活层面来破解异化之谜,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异化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途径,从而敞开人类解放的真实道路。从马克思的异化问题研究中不难看出,当马克思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破解历史之谜的意义之后,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而不再是哲学方面,这不是因为马克思对哲学不再感兴趣,而是马克思发现了经济乃是一切历史之谜的发源地和秘

密所在,是当代社会权力和压迫的根据地,因此要寻求人类合理的现实生活,就必须考察市民社会,即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

从哲学研究向经济学研究的转向,不能仅仅理解为研究领域的转移,而是应当理解为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式的转变。对于马克思而言,问题意识始终是清晰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抑或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生活的实现,在这一问题意识的驱使下,马克思找到了以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透视人类历史之谜的研究方式,所以马克思才将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与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深刻关联,而根本不关心“解释世界”之类的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问题,这也就导致了一种结果:马克思对他在实际上运用着的实践哲学缺乏明确的解释,即马克思只是在运用实践哲学,而没有解释实践哲学,这一表述的任务也就留给了当代学者。因此,下一个问题也就产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体现出实践哲学的意蕴的?我们首先需要避免那种从理论哲学思路去寻找哲学的传统方式,而只能根据《资本论》的问题式来求解《资本论》的实践哲学的体现形态。《资本论》的问题式是“改变世界”,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资本论》的实践哲学就体现为“改变世界”这一宏大事业的不同侧面:经济、政治和批判,或者说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和批判哲学。这三种表现形态正是《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示的三重维度:经济学维度、政治学维度和批判维度,这些维度在《资本论》所展示的哲学空间中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地共存着,共同支撑着《资本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形态。

### 三、《资本论》的实践哲学 I :经济哲学

以马克思的研究历程来看,他早期的哲学因缺乏政治经济学等经验内容的支撑,还处在对传统西方哲学变革的原则化层面,直到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即《资本论》时期,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才获得极大的丰富和充实,这是因为正是《资本论》的创作,“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形式、视野上,而且在内容、细节上真正地摆脱了哲学的抽象化规定。《资本论》哲学通过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层面上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方式,完成了传统哲学只能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与自由的任务,从而在科学理论的意义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考察”,<sup>[5]</sup>这就是《资本论》哲学作为经济哲学的独特规定和重要价值。

《资本论》经济哲学的路径在于:通过经济问题的考察来体现哲学思想,通过经济问题的解决来推动哲学的前进和超越。相比于纯粹探讨本体、真理、认识、自由等问题的传统哲学,《资本论》经济哲学并不是避开这类问题,而是从经济学或经济的视角重新探讨上述问题,这是《资本论》经济哲学的重要特征。《资本论》哲学思想基本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提升出来的,经济学和哲学在《资本论》当中已经是“你中有我”“水乳交融”的状态。为了清晰地展示“哲学”和“经济”在《资本论》中的紧密结合关系,下面以经济哲学的类型区分进一步说明。经

济哲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它直接地以某种经济问题为论题,以某种哲学理论为方法,以经济和现实社会之间关系的某个维度为视域,侧重于研究与经济问题相联系的价值选择、伦理规范乃至社会整体,这种经济哲学致力于经济问题的哲学阐释,这是从经济学上升到哲学的路线。另一种是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它侧重的不是经济问题的哲学阐释,而是哲学理论自身,是从经济或经济学的视角来反思和重构哲学的形式、内容、问题和价值。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径直从经济视角来把握哲学问题,把传统哲学提出的抽象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路径转变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路径,并且使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

不难发现,《资本论》经济哲学正是后一种经济哲学的创立者,它致力于哲学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它选择的是从哲学落实到经济学的路线。在《资本论》中,经济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系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关系到《资本论》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能否指明“改变世界”的现实道路、能够揭示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因为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深刻地理解这样一点: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在欲以改变的现实世界中,以物质生产为表征的经济活动是奠基性、基本性的活动,其他所有活动都是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sup>[6]</sup>经济问题对于《资本论》哲学的重要意义体现在:《资本论》要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就必须首先关注经济领域,通过经济研究来获得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视角,《资本论》经济哲学集中体现着马克思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的重视和研究。对于创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来说,他的哲学离开经济学研究是无法想象的,他的哲学思想就是针对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思想,因此《资本论》的经济哲学改变了传统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创立了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这是《资本论》的经济哲学价值之所在。

#### 四、《资本论》的实践哲学Ⅱ:政治哲学

从描述性意义上来说,当今政治哲学的每一种论说都要面对自由主义这一强势的话语方式,那么与自由主义所形成的以维护市民社会合法性为本质规定的政治哲学传统相比,《资本论》是从根本上开创了一个通过否定市民社会合法性而彰显人类社会的政治哲学传统,因此《资本论》不仅有着属于自己的政治哲学,而且是开创了独特的政治哲学传统。当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时,<sup>[7]</sup>就已经原则性地揭示了《资本论》政治哲学所立足的根据和所彰显的方向,这就是:《资本论》

政治哲学不是面向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特殊阶级,而是面向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就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关系而言,无产阶级是在追求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解放的,因此无产阶级这样一个特殊阶级的解放就展现出对整个人类解放的普遍性意义。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政治哲学就体现为一种普遍性政治。鉴于《资本论》始终遵循着“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的路径,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到《资本论》所批判的政治哲学观念去发现《资本论》的政治哲学。

具体来说,《资本论》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念基础,即自由、平等和所有权,既阐明了被自由主义所重视的观念如何被资本主义经济所表象化,从而成为现代意识形态,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矛盾运动特征,从而为新的政治哲学观念的出场提供现实基础。“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sup>[8]</sup>质言之,相对于自由主义,马克思把抽象的权利阐述转化为现实的自由理论,这样《资本论》在政治哲学领域就实现了革命性变革。

首先,《资本论》要求把作为自然权利的自由落实为人的自由个性。自由主义的自由理论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性的论证模式,即从人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角度来阐释人的自由的合法性,然而马克思发现,人的自然状态只不过是思想家们从现实的人当中抽象出来的原子化个人,因此《资本论》的自由概念考察人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权利逆转以及自由将超出“资产阶级法权”视界的运动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人的独立性”的自由权利,被严格局限在资本范围内和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同时资本造就的人的自由又有全面性,它使人的社会关系变成“全面的关系”,使人的需要变成“多方面的需要”,使人的能力变成“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从而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提供可能性。<sup>[9]</sup>其次,《资本论》要求把抽象的权利平等落实为实质的社会平等。整体来看,自由主义侧重于从起点平等、权利平等的角度来处理人们利益和资源占有的差异状态,即只要人们平等地遵守规则、平等地适用同一尺度,那么即使在结果状态中表现出利益和资源占有的差异,这也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而《资本论》侧重于从结果平等、实质平等来对待上述差异状态,即权利平等的视角由于漠视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对这些不平等的确认,因此真实的平等不仅是形式和程序方面,而且是从结果和实质方面来考察人们对利益和资源的占有状态,因此它只能表现为对不同人的具体分析,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才体现了《资本论》平等观的真谛。再次,《资本论》要求把财产权的正面理解推进到财产权的辩证理解。自由主义以劳动与所有权的同一性观点为

前提表达出对私人财产权的正面理解,即把财产看做是消除匮乏、摆脱贫困、增加财富的手段,把财产权看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基础。然而伴随着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逐渐凸显,财产权开始和贫困、不平等等问题联系起来,财产权与贫困之间的冲突成为现代人追求自由的最大障碍。在此种背景下,《资本论》指出劳动者劳动和所有权相结合的过程实质是资本对劳动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规律表征着劳动者劳动和所有权的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才有可能带来财产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并在客观上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出新社会形态的萌芽,这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对社会财富的占有。

### 五、《资本论》的实践哲学Ⅲ:批判哲学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意味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维度上才成立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批判对象是古典经济学,因此只有结合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才能够理解《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批判哲学。古典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往往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与对立当做肯定性前提,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sup>[10]</sup>这一点体现在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上,便是以经验性和直观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以朴素的直观眼光去看待经济现象,它把看到的现象认做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无批判地认同人们所接触到的经验事实,而不追问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如何历史地产生、又将会历史地消失。因此,它必然会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是非历史性的东西。《资本论》当然批判实证主义,但是,单纯抛弃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并不能超越实证主义,只有揭示出古典经济学囿于经验事实而无法看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来历和本质规律,才能在把握经济现实的基础上超越实证主义。《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的相同之处是:均研究经验事实,具有本质差异的地方是:古典经济学总是肯定经验事实,其所阐发的客观规律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非历史性理解之上,而《资本论》建立在对经验事实的历史性理解之上,将经济事实放置于持续不断的运动过程中去理解,因此当古典经济学以事实之名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非历史化的时候,《资本论》却将其看成是具有自我否定性质的历史性关系。由此,《资本论》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基础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为批判哲学。

关于《资本论》的批判哲学,传统理解方式往往把批判阐释为哲学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哲学是将批判作为工具运用于对对象的分析,这意味着批判在哲学当中处于纯粹形式的地位,可以脱离于具体的内容,以独立化、形式化为特征,以运用到对象领域为目标,即哲学与批判仍然是外在的。然而,《资本论》的批判哲学不能仅仅在功能意义上加以理解。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的跋中以辩证法为题阐述了对《资本论》批判哲学的理解:“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



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1]</sup>这段话显示出,批判不仅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而且直接地就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质,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可能的关键。《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批判的视角、从“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维度批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由此才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未来命运。

进而言之,《资本论》的批判哲学不仅是在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实现出来的,而且是在对象批判的意义上实现出来的。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资本论》,就会发现《资本论》充满着对拜物教、财产权、资本逻辑等诸多现实问题的批判,即对象批判,这表明《资本论》的批判哲学是对象批判和理论批判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2]</sup>古典经济学无非是早期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理论反映,因此,批判古典经济学,应当深入到产生古典经济学的现实问题的批判当中去,只有在实践层面解决了现实问题,古典经济学才能得到彻底的批判,这就是马克思说的理论对立的解决“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的道理。《资本论》批判哲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把理论批判提高到对象批判的高度上加以实现,由此《资本论》才能在原则高度上,即实践批判的高度上实现彻底的理论批判。

### 注释:

[1][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1—222页。

[2][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591页。

[5]鲍金:《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502页。

[8][10][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16、22、2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